

第一章

找寻红色中国

1

一些尚待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里，人们提出了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问题。热切的党人能给你列出一大堆现成的答案，然而却难以令人满意。这些党人从未到过红色中国，他们怎么知道呢？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再没有比中国红军更神秘，被传述得更扑朔迷离的了。封建时代中国的红军在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已与世隔绝了 9 年，但他们一直战斗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腹地。成千上万的敌军如同一堵墙时刻包围着他们；要进入这一地区，比去西藏还要困难。从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在湖南东南部建立以来，还没人愿意穿越这堵墙再返回来写下他的见闻。

甚至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存在着争论。一些人否认红军的存

在，认为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一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的欺骗宣传而已。但是，赤色同情者却称赞红军和苏维埃是疗治中国一切痼疾的良药。在此宣传和反宣传之中，公正的观察家一直苦于缺乏可靠的证据以供证实其真实性。对于那些热心关注东方政治及其风云变幻的历史的人们来讲，仍有一些尚待解答的问题：中国红军是不是一群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是否服从和忠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化纲领和统一指挥？如果是，那么这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声称他们是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实现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战，而南京方面则说红军只不过是由“文匪”领头的新型破坏者和掠夺者而已。究竟孰是孰非？抑或二者都正确？

1927 年之前，共产党员被允许加入国民党，但在那年四月却开始了一场“清洗”运动。在蒋介石发动的旨在夺权并于南京组建“国民政府”的右翼政变中，大批的共产党员、无党派的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被屠杀。此后，凡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同情者都被当成罪犯处死，成千上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仍有许许多多的人继续冒险，农民、工人学生和士兵参加了红军，武装反抗南京当局的军事专政。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如此不屈不挠地坚持危及他们生命的政治观点呢？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与别处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旅游者问他们是否留着长胡子，喝汤时发出难听的声音，还在包裹里挟带着自制的炸弹？较认真的人想要知道他们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

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与他人创建的，在所谓大革命时期（1923—1927）掌握着领导权。共产党，或称中国共产党，创建于 1921 年，在这一时期则是国民党的主要同盟者。

《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吗？他们有一个详尽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吗？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抑或两者都不是？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吗？他们真是国际主义者吗？“仅仅是莫斯科的工具”，还是主要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是什么人，竟如此长期地、勇敢无畏地战斗？还有，正如观点各异的形形色色的观察家和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议论认可的那样——这些人在总体上竟如此地不可战胜，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他们从事的这场斗争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希望、目的和梦想使他们成为难以置信的顽强勇士——联系中国人以往的妥协历史，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经受了无数次战斗、封锁、缺盐、缺粮、疾病和瘟疫，最后进行六千英里的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二个省，突破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地进入西北新的根据地，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的领导者是谁？他们是有炽热的理想信仰、意识形态和主义的受过教育的人吗？他们是社会预言家，抑或仅仅是无知的农民为了生存而盲目地战斗？毛泽东^①，这位南京开列的首号“赤匪”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人？蒋介石居然出二十五万银元悬赏捉拿他，不论死活^②，在这颗高价的东方头颅里是什么在运转？或者真的象南京方面正式宣称的那样，毛已死了？朱德^③——这位红军总司令，他的命对南京来说也一样值钱，他是什么样的人？还有林彪^④，这位年方 28 岁的红军军事家，据说他领导的著名的红军军团从未打过败仗，他又是什么人？来自何方？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他们不断被报道已经毙命，却又在报纸上一再

参见第四章及“人物注释”。

② 当时中国的一元钱相当于 0.35 美元。

③④ 见“人物注释”。

出现——非但毫毛无损，而且还在指挥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新的战斗，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如何解释红军在 9 年里抵抗国民党强大军事吞并的非凡战绩？他们缺少工业基地，缺少大炮、毒气、飞机、金钱和现代技术——这一切南京用来进攻他们的东西，这些共产党是怎样幸存下来，他们的队伍又是怎样地在不断壮大，打不完，灭不掉？他们用的是什么军事战术？又是怎样被指挥的？谁给他们当参谋？他们有俄国的军事顾问吗？是谁领导他们技胜一筹，不但挫败了国民党将领，而且先后挫败冯·西克特将军和冯·弗克豪森将军为首的、蒋介石重金聘来的德国军事顾问？

中华苏维埃又是什么样？农民支持它吗？若不然，又是什么把它结成一体？共产党在他们已经巩固了政权的地区实行了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为什么红军不去夺取大城市？这是否说明它不是真正由无产者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是农民造反？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以农耕为业的中国，整个工业仍在襁褓之中——若不说是患了小儿麻痹的话，怎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红军穿、吃、爱、消遣或工作如何？他们的婚姻法如何？妇女是像国民党政论家所说的那样被“共产”了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什么？红色剧团是什么？他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他们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以及“红色文化”怎样？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是共产国际夸口的 50 万人吗？如果是，为什么它还没夺得政权？它从哪儿得到武器和军需物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中国军队吗？它的士气怎样？军官和一般人住的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总司令于 1935 年宣称的那样，南京已经“摧毁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又如何解释 1937 年红军所占领的一大块连成一片的地区（在中国最有战略地位的西北地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一事实呢？如果红军已经完了，那么为什么当

南京与东京和纳粹德国签订反共协定时，日本的广田弘毅（日本外相，1933—1936）还提出著名的第三点，即“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克化”呢？共产党是真的“反帝”吗？他们真的想同日本开战吗？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莫斯科会支持他们吗？难道真的如胡适博士在北京极力劝说他那些情绪激昂的学生时所说，他们的那些言辞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想要赢得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尝试，是叛徒或匪徒最后绝望的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和军事上前途如何？其发展趋向怎样？能够成功吗？这样的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呢？这个有世界五分之一（一些人说是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一旦发生巨大变化，其影响是什么？会使世界政治以及世界历史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它会给英、美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外交政策”？

最后，共产党主动提出在中国组成一个“全国统一战线”，结束内战，这意味着什么？竟然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用自己调查得来的事实，自信、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可笑又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其利害和重要性与日俱增的故事，是一个中国专有的故事，就像新闻记者们在发送无关宏旨的消息时彼此承认的那样。然而我们对此又都可悲地无知。想与“白”区的共产党接触极其困难。

那些已被判了死刑的共产党人，不管是在“礼貌”的诱导下，还是面对残暴的酷刑，都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甚至在国外租界里，南京当局不惜重金买通外国人密探网去捕捉自己的目标。这些侦探包括，诸如 C. 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的巡捕，他是前上海租界英国警察局缉共负责人。吉文斯巡捕每年都因其有所捕获而得到嘉奖——被捕者被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后，相继被监禁和杀戮——他们多数是十五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吉文斯不过是南京政府为缉拿激进的中国青年而雇佣外国侦探中的一个

罢了。

我们都清楚，若想了解红色中国的情况，就必须到红区去。我们自己找借口说：“没有法子。”有几个人试了试，都失败了。他们认为能进入红区又活着出来简直不可能。

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密友带消息给我说，中国西北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总司令被捕，从而改变了当时的中国历史。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有了进入红区的可能的办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而且必须立即出发，我要打破长达九年的新闻封锁。

尽管后来有报导说我死了——“被土匪杀害”——这虽言过其实，但确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由于那些一直接受中国津贴的中文和外文报纸多年来一直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红军暴行的恐怖故事，一路上，除了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一封信使我略感宽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1〉我必须找到他。至于这要冒多大的风险？我不知道。但在国共交战的年月，已有千千万万的人丧生。为了探寻其中缘故，拿一个外国人的脖子去冒一下险又有何不可？我发现我自己就长着这么一根脖子，但我敢说这个代价并非高得付不起。

怀着这种“杀身成仁”的心情，我上路了。

2

通向“西安”的慢车

六月初的北京披着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颇具皇家气派的柏树使紫禁城显得神秘莫测。清静的庭院很难使人相信金碧辉煌的宫殿这竟是一个劳苦、饥饿、革命和饱受外国欺凌的国家。

在这里，每天吃着西餐大菜的外国人在他们自己那从不受干扰的小天地里悠然地喝着威士忌苏打

水，打网球，闲聊，逍遥自在，从不顾忌那高大肃穆城墙外面的人世消长。

然而就是北京这块绿洲，在过去一年里也为弥漫于全中国的战争气氛所侵染。日本入侵的威胁已经激起了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数月前，我曾伫立在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目睹了万余名学生举行集会，在手持棍棒的宪兵面前，齐声高呼：“坚决抗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华北的阴谋！”

中国红军欲经山西向长城进军——树起了抗击日军，收复失地的战旗。红军的声威是北京的防御攻势无法阻挡的。这个有点堂·吉珂德式的远征立刻被蒋介石总司令的精锐新军¹¹师所阻拦，但爱国学生却是阻挡不住的，他们冒着被监禁甚至杀头的危险涌上街头，呼喊着重：“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击日本！拯救中国！”口号。^①

一天半夜，我兴奋地登上了一列破旧不堪的火车，虽谈不上舒适，但心中却很满足。因为我终于踏上了探险的旅程，要去的地方与中世纪辉煌壮丽的紫禁城隔着千百年和千百里的时空：我要前往“红色中国”。我在成行以前，注射了各种预防针，预防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这五种病在西北都流行。有一篇令人惊恐的报道说，目前西北正流行一种淋巴腺鼠疫病，中国陕西是世界上流行此病的重灾区之一。

我的直达终点是西安府——意即“西部平安”。^②西安府是陕西省省会，从北京乘火车，要经过两天两夜的疲惫旅行才能到达这个位于北京的西南方，陇海铁路西端的城市。我计划从那里向北走，进入地处中国大西北腹地中心的苏维埃边区。在西安府以北一百五十英里的洛川镇，是陕西红区的起点，从那儿往北，除了公

^① 1935年12月9日的学生游行示威，对共产党来讲是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学运的领导者有黄敬和黄华等人。参见“人物注释”。

作者理解有误。西安古称长安，即“长治久安”之意——校注。

路干线两旁的狭长地和后面提到的几个点外，都已被赤化。红军在陕西控制的区域，大体而言，南起洛川，北抵长城，东、西均以黄河为界。这条从西藏边缘流下来的宽阔浑浊的大河向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以北进入绥远省——内蒙古，然后弯弯曲曲东流许多英里，转而向南，穿过长城，形成陕晋两省的边界。

当时的苏维埃就在这条多次改道的大河的巨大的曲臂之内——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这就是中国炎黄祖先生息繁衍的地方。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是在这一带形成了民族。

次日早晨，我注意到同车的旅伴，在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位青年和一位端庄的老人，老者留着一把白胡子，呷着苦茶。青年人不一会儿就同我攀谈起来。起初还有些拘谨，谈着谈着就不免涉及到了政治。我了解到，他的内叔是铁路上的一个官员，因此他可以免费乘车。他此行是回四川老家，七年前他离开了那里。能否抵达家乡他没有把握，据说那一带有土匪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说四川也有红军，可我讲的是土匪。”

“红军不也是土匪吗？我刨根问底道，报上总称他们是赤匪或共匪。”

“噢，你要知道编辑得管他们叫土匪，因为南京要他们这么做。”他解释说，“要是他们也把那些人叫做共产党或革命者，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不是革命者了。”

“可是在四川，人们不是也像怕土匪一样怕红军吗？”

“这就要看情况了。富人怕他们，地主、官吏和税吏也怕。但农民不怕他们，有时农民还欢迎他们。”说着他不无顾忌地瞥了那老者一眼，只见他坐在那里留神听着，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

“你瞧”，他接着说，“农民太愚昧，他们不明白红军只想利用他

们。他们以为红军真像他们自称的那样。”

“那红军不是像他们自己讲的那样吗？”

“我父亲写信告诉我，他们在松潘（属四川）取消了高利贷，禁了鸦片，还重新分了田地。所以他们看上去并非地地道道的土匪，他们毕竟有他们的一套主义。但他们都是恶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白胡子老者非常沉着地仰起了他那平和的脸，蹦出一句令人吃惊的话：“杀得还不够！”我们两个都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不巧，火车已近郑州，我得换乘陇海线的车，谈话只好中止了。但我很想知道那位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不容置辩的论据来证实他那令人惊异的论点，在第二天的行程中，随着我们的车缓缓地驶过豫陕之间那天成的奇境般的黄土重峦，我一整天都在寻思这件事，直到我乘的列车——这车还很新，也很舒适——抵达西安府颇为漂亮的新火车站。

我抵西安不久，就去拜会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①两年前，杨将军还是陕西省未被红军控制的那部分地区的土皇帝。他先前是土匪，后来通过那条曾使中国许多最能干的人当了官的途径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据说他也照例在这同一仕途上发了迹。但近来，他不得不与同在西北的另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力了。因为在1935年，曾是满洲统治者的少帅张学良，已把他的东北军开进了陕西，并任此地剿共最高长官——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为了牵制这位少帅，蒋介石总司令的助手邵力子^②又前来任陕西省主席。

这种微妙的权力平衡一直在这几位——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

见“人物注释”。

② 参见“人物注释”。

保持着，在他们背后操纵的无疑是蒋总司令本人，他企望把他的独裁扩展到西北，不但消灭共产党，而且击垮或消灭杨虎城和张学良的部队——显然，蒋介石以为，在这三幕精彩的政治军事剧目中，只有他自己了解其中的端倪。但因蒋在追求目标时操之过急，以及过于自信地低估了对手，使他在数月后在西安被拘捕，不得不听凭三方面的摆布。

我在一所新落成的、耗资 5 万元的石头府邸里见到了杨将军。^①他住在这座有许多房间的拱顶建筑——绥靖公署主任官邸里——身边没带夫人。同这个过渡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杨虎城也拖着一个家庭包袱，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妻子，由他的双亲在蒲城给包办的。第二个象蒋夫人宋美龄那样活跃自信，勇气十足，是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年轻漂亮的母亲，她摩登、进步，据说以前入过共产党，是杨自己选中的。据传教士们讲，新宅落成后似乎他的两个太太都向他提出了同样的最低要求，两位太太彼此不容，两人都为他生了儿子，有权成为他的合法正房妻子；两个都断然拒绝搬入这所宅第，除非对方不住里面。

在旁人看来，此事很简单：离婚或者另娶第三个妻子就是了。但杨将军迟疑不决，只得一人独处。他所处的困境在现代中国没什么特别。蒋介石就面临过同样的难题，他与富有的、受美式教育的宋美龄结婚时，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能接受一夫多妻制。最后蒋介石只得同他的第一个妻子（其子蒋经国的生母）离了婚，并付给他两个姨太太生活费，把她们打掉的。这一做法深受传教士们的赞扬，这些人此后一直为他的灵魂祈

我是由王炳南（参见“人物注释”）引见给杨将军的。王与他的妻子安娜当时就住在杨家。王是杨的政治秘书，也是中共中央与张少帅、杨将军之间在西安的主要的联络官。

② 参见“人物注释”。

祷。不过这种办法——系出自西方进口的时新观念——仍旧令许多中国人大皱眉头。在这些人中长大的杨，恐怕更关心他的祖宗的传统而不是他自己灵魂的归宿。

切莫以为杨早期的土匪生涯就会使他不配当领导人。这种设想在中国并不成立，在中国，一个人早年当过土匪常常正说明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一些最有才干的爱国者往往被扣上土匪的帽子。事实是许多最坏的流氓、恶棍和卖国贼就是在冠冕堂皇，伪善透顶的儒家言辞和儒家权术的掩饰下上台的——虽然他们常利用一些诚实土匪的诚实和强悍来达到目的。

杨将军做为一个革命者的历史使我们看到：一个也许曾梦想彻底改变他周围世界的憨直粗莽的农民，一旦手握权柄，他也只能徒劳地寻找着救国的良方妙药，疲惫不堪地斡旋于围着他转的幕僚食客的游说之中，他即使有这样的梦想，他也不会向我诉说。他不谈政治问题，客客气气地派他的一个秘书带我参观这座城市。我见到他时，他正患着剧烈的头痛和风湿病，此刻，我不想执意问些令他不快的问题。相反，我对他的困境充满了同情。和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后，我便识趣地退了出来，去尊敬的邵力子主席那里找答案。

邵主席在他宽敞的办公庭院里接见了，我，刚刚领教了西安街道上尘土飞扬和灼人酷热之后，这里显得格外凉爽和宁静。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那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那次他帮助我采访了蒋。此后，他在国民党内升迁很快。他是个有才能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又提拔他当上了尊荣显贵的省主席。然而可怜的邵先生，同许多其他的文职省主席一样，他所管辖的范围囿于省城的灰墙之内——外面的地区分别归杨将军和少帅管辖。

邵力子先生本人曾入过“共匪”。他在中国共产党中曾扮演

过先锋的角色。在那个时期，参加共产党是件时髦的事情，没人确切地了解它意味着什么，只晓得很多聪慧的青年人都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在 1927 年，形势变得明朗了，一个人若成为共产党，就意味着他的脑袋要搬家。于是邵退出了共产党，随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且表现得再也没有一点异端的痕迹。他是中国最有魅力的绅士之一。〈1〉

我问他：“红军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没剩下多少了，来到陕西的这些是残余。”

“那么战争还在继续吗？”我又问。

“不，目前陕北几乎没有战事。红军正在向宁夏和甘肃转移。看来他们是想与外蒙古取得联系。”

随后他又将话题转到了西南地区的局势。在那里，一些反逆的将军们要求抗日。我问他中国是否应当抗日，他反问道：“我们能吗？”这位佛教徒还对我讲了他对日本的想法——不可公开发表——同许多向你谈及他们对日本的想法的国民党官员一样——不让你公开报道他们的意见。

这次谈话过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就在对日战争的问题上——和他的总司令一起——被少帅张学良部队的一些反叛的青年人——逼上了绝境，他们不肯作符合民心的决定，也不再兑现“总有一天”的答复了。邵娇小的妻子——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前共产党员——也被这些暴动者弄得走投无路，还大胆地拒捕了一下。

但邵在我们的交谈中显得对这一切毫无预感，我们互相交换看法，并逐渐接近一致，随后，我便告辞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了我想知道的事。他证实了在北京为我提供消息的那人的话。陕北已暂时休战，因此，若安排得当，去前方该是可能的。

3

汉代青铜

我到西安后大约六个月，西北的危机出人预料地爆发了。整个世界戏剧性地得悉，少帅张学良的大军与他以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受命前去剿灭的“共匪”结成了令人惊诧的联盟。1936年6月，对于事态反常的发展外

界还蒙在鼓里，就连控制着西安府警察的蒋介石自己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无人能确切了解即将发生的事情。该城的监狱里，关押着大约 300 名共产党人，蓝衣社还在搜捕。气氛极其紧张，到处都有各方的密探。

现在再也没有必要继续隐瞒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隐瞒那些不得已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我将在此一一报道出来。

在到达西安以前，我从未见过红军。我知道，在北京用隐形墨水为我写带给毛泽东的信的那个人是一位红军指挥员，但我并没见到他。这封信是由第三者，我的一位老朋友转给我的。除了此信外，我与西北取得联系就只有一线希望了。我被直接介绍给西安的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等待一位自称姓王的先生的来访，但关于此人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将安排我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进入红区。

我住进旅馆之后几天，有一位身材高大，身体健壮，仪表威严，脸膛红润的中国人进了我开着门的房间，并且用流利的英语和我打招呼。他身着灰色丝绸长褂，看上去像个富商，可他自我介绍说姓王，并提到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的名字，还用别的办法证实了他就是我要等的人。

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发现就光为王一个人，也不枉来西安一

趟。每天我都要花上四五个钟头听王讲他的轶事和回忆以及他对政局的严肃的分析。他是一个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人。他在上海受的是教会教育，曾是基督教社会里的著名人士，他有过自己的教堂（我后来才知道），在共产党人中，他被称为王牧师。像上海许多基督徒那样，王曾是青帮成员^①，他认识从蒋介石（也是青帮成员）到该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每一个要人，他也曾任国民党的高级官职，但我在这里不能泄露他的真名。〈1〉

长期以来，王牧师就背弃了他的会友和官职，一直在为红军工作。至于多长时间，我不清楚。他是共产党争取各方军事家和政治家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联络的机密的非官方使者。至少与张学良的联络，他是成功的。在此，有必要对此时已经达成的默契基础的背景作一介绍。

到 1931 年为止，张学良一直是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事独裁者，他从他的大军阀父亲张作霖那里继位并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承认，还被委任为中国军队的副总司令。他受人欢迎，喜欢赌博，慷慨大方，有现代意识，好打高尔夫球，还吸毒，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1931 年 9 月，日本占领东北，张的背运开始了。日军入侵时，张少帅正在长城脚下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他无力独自应付这场危机，只得大大地依靠南京和他的歃血结义的“大哥”蒋总司令。但蒋介石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既打日本，又打红军，他急于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接受了总司令的劝告和南京的命令。结果，他丢掉了他的家乡满洲，他的部队只是自发地进行了一些抵抗后就撤退了。南京的宣传使人相信这种不抵抗政策是少帅的主意，然而有文字表明这种政策是政府明确的命令。这个牺牲使总司令得以维持他在南京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并得以发动一

^① 青帮是黑社会的帮派，他们控制了鸦片、赌博、卖淫、绑架等业并从中牟利，受到外国殖民当局和法国租界的保护。1927 年，它帮助蒋介石摧毁了共产党领导的联盟，进行了“上海大屠杀”。参见第 2 章第 2 节。

场对共产党的新围剿。

这就是东北军移入关内的原因。日本侵占热河时，故事又重演。这次张学良不在医院，虽然他本该住院的。南京既不给他任何援助，又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总司令想避免战争，准备坐视热河落入日本人手中——热河果然就这么沦陷了。张学良承担了罪责。为了平息民愤，总得有人辞职。在蒋张二人中，不是蒋就是张，后者驯顺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屈身离去，到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

在欧洲，对张学良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他看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或会见了拉姆齐·麦克唐纳，而是他治愈了毒瘾，数年来，他头一次发现自己是个健康的人。几年前，他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同许多中国军官一样，是在戎马生涯中染上的。要除掉这个恶习并非易事；他的医生要他用注射药物来治疗。他治愈了鸦片烟瘾，可是后来他又染上了吗啡嗜好。

我第一次见到张是 1929 年在沈阳，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统治者，看起来相当不错。他精瘦，脸有点长，且黄，但思维敏捷，有魄力，似乎精力很充沛。他公开反日，渴望出现奇迹，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并在满洲实现现代化。数年后，他的健康状况更差。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去两百元——一种特制的吗啡，理论上讲是可以“逐渐减少”的。

但赴欧洲之前，张学良在上海就开始了戒毒治疗。1934 年他归国时，朋友们既高兴又惊奇：他的体重增加，肌肉健壮，面颊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人们从他身上又看到了从前那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领袖的影子。过去他空为思想敏捷，有现实头脑，现在，这些才华有了施展的机会。在汉口，他重掌东北军的指挥权，被派往内地去打红军。尽管他过去犯了错误，他的军队仍热情地

欢迎他回来。

张开始按时作息——每天 6 点钟起床，刻苦健身和读书，粗茶淡饭，养成了斯巴达式的习惯，还与自己部队的下属军官保持直接的个人联系。这支队伍仍有十四万人。东北军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抱怀疑态度的人逐渐确信少帅重又成为瞩目人物，他们认真地看待他回国后的公开誓言：他的整个一生要献给光复满洲的事业，要洗刷掉他的人民所蒙受的耻辱。

同时，张对蒋总司令并未失去信心。在他俩的全部关系中，张对这位年长者的忠心从未动摇过，他曾三次挽救蒋介石政权免于垮台，并对后者的判断和诚意怀有充分的信心。当蒋介石说他正准备收复满洲，决不再不作任何抵抗就拱让领土时，张学良显然是相信他这番话的。然而，1935 年，日本人继续进行侵略：冀东傀儡政权成立，察哈尔的一部分被吞并，他们还提出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方面部分地默许了。尤其是少帅的部队又被调往西北去进攻红军，继续这场不受欢迎的内战，而日本人还是不断地制造事端（恣意妄为），却几乎未遭任何抵抗，这使得东北军官兵更是满腹怨言。

在南方与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之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逐渐认识到：他们与之交战的“土匪”实际上是由一些有才能的、爱国的、抗日的指挥员领导的；“共产党末日”的来临也许要拖很多年；在剿共战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抗日是不可能的；东北军在这场对它来说没什么意义的战争中，除迅速减员以至于垮掉之外，不会得到什么。

尽管如此，张学良在把总部迁到西北后，还是对红军发起了一场强大的攻势。他一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 1935 年 10 月至 11 月间，东北军损失惨重，据报道它丢掉了两个整师（101 师和 109 师）以及另一个师（110 师）的一部分。许多东北兵“倒戈投了”红军，许多军官被俘，并接受了一个时期的“抗日教育”。

这些获释后返回西安的军官，给少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番苏区的士气和组织，特别是红军力主停止内战，以和民主方式统一中国，联合抗日的诚意。这使他颇有感触，他感触更深的是来自他的师团的报告，该报告说全军的情绪正转向反对剿共战争，共产党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正在影响着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自己也受到了左派的强烈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都来到了西安与他共事，这批人中就有一些共产党人。1935年12月日本人在北京提出要求后，他传话到北方：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来西安。当南京政府的代理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大肆搜捕鼓动抗日者时，西安却鼓励和保护他们。张的一些青年军官也深受学生们的影响，那些被俘的军官从红区返回后，报告了那里公开抗日的群众组织很活跃，又描述了红军在人民中的爱国宣传，张愈来愈意识到红军是天然盟友而不是敌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牧师告诉我说，1936年初，他有一天拜访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提出：“我来是想借你的飞机去红区。”

张跳起来惊异地盯着他：“什么？你竟敢来这儿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知不知道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毙了你？”

牧师态度安详慢慢地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那些张学良应该知道的事情。他用了很长时间来讲共产党目前的政策，中国联合抗日的必要性，共产党为促使南京抗日可以做出重大让步的愿望，以及共产党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等等。他建议由他安排张与适合的共产党领导人就这些问题举行一次会谈。张学良先是吃惊，后来还是极为耐心地听完了这一切。他忖度良久，考虑他可以利用一下红军，显然他们也想利用他；很好，也许他们可以在共同要求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基础上互相利用。

王牧师终于乘了少帅的私人飞机去了陕北延安。他进了苏区